

# 信札中的微观心理学历史： 黄翼形重错觉研究报告的曲折境遇\*

阎书昌<sup>1</sup> 高志鹏<sup>2</sup>

(<sup>1</sup>河北师范大学心理学系, 石家庄 050024) (<sup>2</sup>约克大学心理学系, 多伦多 M3J1P3, 加拿大)

**摘要** 本文透过微观历史的视角, 以黄翼与周先庚、吴有训等人的 10 余封通信为素材, 还原了黄翼两篇形重错觉研究报告的评审与发表过程, 揭示出黄翼与审稿人汪敬熙、主编吴有训、好友周先庚以及导师格塞尔之间的冲突、协商和复杂的学术互动。这些信札作为私人交流的媒介, 记录了当时心理学知识生产中局部的、互动的、存在于特定关系之中的思想、计划和动机。信札中的对话涉及到当时心理学学术成果评审的几方面核心问题: 评审标准和流程、写作语言规范、学术权威、同行举荐、创新性认可、文献引用等诸多问题。本文进一步以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 解构学术“象牙塔”的传统形象, 以此揭示和反思心理学知识生产的内在过程。

**关键词** 黄翼; 信札研究; 微观心理学历史; 学术规范; 科学知识社会学

**分类号** B84-09

天实负我三十年寿命, 吾将索焉。

——黄翼(1903~1944)

## 1 引言

心理学历史是由丰富而生动的细节构成, 历史学家往往需要扬弃诸多细节, 以总结出心理学发展的主线。同时我们需要认识到, 历史事件是由具体人物在复杂的互动、特定的环境中推动的。如果说宏观的历史研究告诉我们哪些事件曾经发生过, 那么微观的历史往往能够充分地解释这些事件是怎样发生的。除了大量“琐碎无用”的历史细节之外, 还有一些细节涉及到学术研究的核心活动, 值得深入还原和研究。本文对心理学家黄翼两篇研究报告的发表风波进行微观历史研究, 藉此来展示心理学研究报告审稿规范的早期实践, 进而讨论心理学知识生产的影响因素。

现代心理学家黄翼(1903~1944), 字羽仪, 192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 翌年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进修心理学, 在实验心理学家推孟(Lewis M. Terman)和迈

尔斯(Walter R. Miles)的指导下获得硕士学位。1928年他转赴耶鲁大学, 在格塞尔(Arnold Gesell)和考夫卡(Kurt Koffka)的指导下进行儿童心理学和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 后获得博士学位。1930年毕业后回国任教于浙江大学, 倾力于心理学专业建设, 筹建心理学实验室, 创办培育院, 在心理学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应用等方面都取得了非凡成就。抗日战争期间黄翼经受了极端贫穷和病痛的折磨, 于1944年底不幸英年早逝(参见 黄文宗, 1984a; 范庭卫, 2009)。格塞尔得到噩耗后在《科学》上发表了一则爱徒黄翼的讣告(Gesell, 1944)。其后, 美国《普通心理学期刊》(*The Journal of General Psychology*)于1945年第1期(实际刊出时间为1946年1月1日)上同时刊出黄翼两篇研究形重错觉(size-weight illusion)的文章。在抗战刚刚结束之际, 中国心理学界满目苍夷的环境下, 这两篇文章的发表不可不谓国内心理学界引以为豪的事情。然而, 心理学家沈有乾(1984)却曾称: “其研究报告传闻曾被某机构歧视, 不予接受, 然卒用英文发表于美国期刊。”这则

收稿日期: 2016-03-16

\* 中国科协“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项目资助(2012-F-Q-XH09)。

通讯作者: 阎书昌, E-mail: yanshuchang@126.com

“传闻”背后的故事是什么？近些年来黄翼同窗好友心理学家周先庚的学术档案资料得到了发掘和整理，该档案资料中保存着周先庚与黄翼的多通信件，为揭开这段“传闻”提供了珍贵的历史文献。其大致情况如下，黄翼于1941年曾将两篇短报告投稿到战时中国对外交流的唯一高级学术出版物——《科学纪录》(*Science Recorder*)，在收到审稿专家汪敬熙的批评意见之后，黄翼愤愤不平，随即向主编吴有训表达不满，同时又向周先庚诉苦并得到同情。1943年黄翼将各扩充、完善至30多页的两份稿件投给当时袁同礼主持工作的国际学术文化资料供应委员会，未料汪敬熙再次成为审稿专家，并提出了修改意见。黄翼拒绝修改稿件，将它们转投到美国的《普通心理学期刊》，最后在前导师格塞尔的支持下得以发表。这中间的曲折是如何发生的？汪敬熙究竟提出了什么样的审稿意见？黄翼为何如此气愤？周先庚在同窗好友和学术权威之间如何周旋？人际关系和学术规范是否产生冲突？《科学纪录》和国际学术文化资料供应委员会是什么样的期刊和机构？抗战期间的心理学家是怎么进行实验研究、审稿工作？如何与同行们进行交流？审稿的标准包括哪些方面？在产生学术争论的时候，学者们用怎样的策略来进行判断和说服？以历史文献为基础，展开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无疑将会丰富我们对抗战时期心理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学术评审乃至中国现代心理学学术制度发展历程的认识，本文将据此开展相关的讨论。

## 2 研究素材和方法

### 2.1 信札研究

档案文献是历史研究的基石，按其公开程度划分，一类属于正式、官方或者公共性的档案，诸如政策文件、会议记录、工作计划、书籍等；一类属于私人化的档案，例如信札、日记、手稿等。在本研究中，我们以有关黄翼发表风波的一组信札(函件)为主要研究素材，以其他历史材料为辅展开相关论述。这组信札(函件)总共13件，写于1941年到1944年，所涉及的通信者为黄翼、周先庚、吴有训、汪敬熙等4人，均未公开发表过。其中一部分内容直接涉及黄翼的发表风波，另一部分内容则展示了当事人研究工作的背景、过程以及生活状况。

国际心理学界一直存在着以心理学家之间私人信件研究心理学历史的传统(Benjamin, 2006; van Rosmalen, van der Horst, & van der Veer, 2011)。国

内近年来出版的《潘菽文集》中也收录了潘菽写给心理学者们的大量信件(中国心理学会,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2007), 使信札研究在中国心理学史研究领域初露端倪。《潘菽文集》第九卷以整理、再现信件为主, 而本文试图把黄翼等人的信件还原到当年的历史背景当中, 并且进行深度解读, 做一次心理学史研究方法论上的尝试。信札不同于其他历史研究素材, 作为私人交流的媒介, 它记录了局部的、互动的、存在于特定关系之中的思想、感受和动机。也正是因为其私密性和互动性, 信札提供了历史事件背后更为丰富的细节性内容。如果我们把心理学家公开发表的著述当作历史研究素材, 那么我们看到的是他们阶段性的历史成果, 但是以与之相关的私人信札作为研究素材的话, 我们就能看到这些著述“生产”的部分性动态过程。本文涉及的信札内容包括了一系列冲突的场景: 投稿人和审稿人之间屡次发生矛盾, 主编、同事的周旋、调解等等。同行评审是学术研究活动当中的关键环节, 能够通过控制学术作品的发表来划定知识的合法性界限, 并引导研究的发展动向。在我们要分析的信札中, 各方在解决审稿分歧的过程中探讨了学术价值、学术规范等科学活动当中的核心问题。因此, 虽然这一批信件看似是私人化的材料, 但实际上它们带来的启示远远超出了私人领域, 而是展示了当时中国心理学界内部学术研究活动中诸多观念的碰撞, 乃至心理学学术活动和研究报告审查机制中一些关键的信息。

### 2.2 微观历史和科学知识社会学

作为一次心理学史方法论上的尝试, 我们从微观历史的视角对黄翼论文发表风波进行解读。不同于关注大范围、长跨度的宏观历史, 微观历史更多地聚焦于小型的研究单元——具体的事件、个体、活动等, 对其进行细致入微地考察, 在此基础上展示超出这些细节和情境的学术关怀。宏观历史往往关注历史的阶段性成果: 一个组织的建立, 一本书籍的出版, 一个学派的成形, 等等, 但是通过微观历史我们能够发现这些成果的出现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过程; 相反, 它们的背后充满了复杂的互动。从宏观的角度来看, 这些细致的动态可能在学术成果形成之后被“扬弃”掉, 但是我们接下来会指出, 学术的价值、规范、团体、成果等恰恰是在这些具体的、细致入微的互动当中实现的。

在本研究中, 我们以一组信札为出发点, 关注黄翼、汪敬熙、周先庚、格塞尔等人的学术背景、

性格、人际关系、生活处境等,试图还原当时论文发表风波的内部过程。我们基于“过去的精细文本(the fine texture of past)”对这一过程进行了“深描”(thick description,又译作厚描)式地呈现(Sokal, 2003),并从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Bedeian, 2004)的视角来解读这一段微观历史。也就是说,我们不认为学术活动是在理想化的、纯粹的象牙塔内进行。实际上,它受到各种社会环境、物质条件、组织结构、人际关系、行动者的人格和心理状态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之间不仅仅存在融洽的合作,还有冲突、斗争、协商和让步。

最终,我们希望能展示对两个学术问题的关怀。第一个问题,即抗战时期心理学研究是怎样进行的,它涉及到当时心理学者的工作环境、学术团体中的人际关系和动态、国内和国外学术界的交流等。第二个问题涉及到当时心理学者们如何在合作、冲突和协商的过程中建立、挑战和完善学术规范,如何贯彻学术价值观以推进研究进展。我们认为第二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黄翼事件所处的历史时期,也就是说从中发掘出的内涵对于我们当今的心理学界亦具有参考价值。

### 3 黄翼投稿《科学纪录》受挫及其反应

#### 3.1 战争年代黄翼的生活、研究境遇及投稿受挫

1944年10月18日黄翼过世后,费巩在祭文中写道:“含容隐忍,病根实种,卖文为活,典质渡日。”(转引自王淦昌,1984)这是黄翼当时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抗战爆发后,战火波及江浙一带,浙江大学历经两年的辗转迁徙后于1940年在遵义、湄潭建校。在随校迁徙中,黄翼变卖了所有家当,一贫如洗。随后黄翼的生活更加艰辛,常常没钱买菜,甚至吃饭都有断顿的危险,到了“债台高筑,衣履不全”,“生计无法维持”的地步。艾伟曾聘请黄翼到重庆作短期演讲,可得数百元酬劳。黄翼经打听得知此行会赔垫上一千元钱,尽管他十分想借此行读到一些期刊资料,会晤同好,却不得不放弃,只能发出“死困一隅,寸步难行,奈何!”的长叹<sup>1</sup>。出于生计的考虑,黄翼不得不考虑“多做有酬短文,

应付眉急”,或者采取向索要书稿的组织机构预支一些“抄写费”的办法。经由冀朝鼎介绍,黄翼应贺麟之聘曾着手翻译格式塔心理学家苛勒的著述,酬劳为每千字三十元,借以糊口。无奈之下,黄翼还放弃人寿保险,索回保费以度日,此事令他瞻前顾后并患上失眠症。在译书过程中他又因“无译书经验,行文极为迟滞,工作又不肯草草,过去一月仅得一万字……满冀一两月支费一次以救眉急,若须待脱稿半数方得计酬,数月之内,且索我于枯鱼之肆矣。”<sup>2</sup>黄翼平时会胃痛,以为是胃病,后一经诊断为胃癌,就已经到了晚期不治的地步。极度贫困是黄翼英年早逝的原因之一。在如此艰难的岁月,黄翼却丝毫没有松懈自己在心理学上的追求。

黄翼在美国接受过严格的实验心理学训练,回国任教于浙江大学心理学系之后在实验方面仍有执着的追求。在生活极其艰难的处境之下,黄翼也发出过“几欲弃此误人职业,另抱琵琶,事实上亦无路可走,奈何奈何!”<sup>3</sup>的苦闷,但最让他无法割舍的是浙江大学在心理学方面积累下的400余册期刊和若干书籍,这是他多年仰仗的文献资料,离不开它们。黄翼多年关注的研究主题之一是形重错觉,即物体轻重错觉与知觉之间的关系问题。因为当时国内心理学实验仪器匮乏,黄翼不得不亲自动手制作实验仪器或求助于机械系的同事,但终因条件限制,至其去世,他设想的一套简单仪器历经10多年也未能制作出来(陈立,1944)。另外,由于浙江大学不断迁徙,教员流失,助教难以寻觅,使得黄翼在心理学实验方面的工作迟迟得不到推进,无奈之下多次向周先庚写信求助,希望能够从西南联合大学推荐优秀毕业生到他手下工作却未果。即便如此,黄翼仍在形重错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国立中央研究院于1940年筹备外文期刊《科学纪录》,鼓励国内学者将其研究的重要内容以短篇报告形式先发表于此,选录文稿以原创性研究为标准,可用英德法文撰写。该刊由西南联大吴有训任主编,在抗战时期起到向国外学界传递中国学者研究成果的作用。1941年底黄翼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两篇英文短篇报告投稿到该刊,随后因这两篇报告被审稿专家拒稿而引发了一场“风波”,这场“风波”涉及到当时国内心理学界内部的论文审查制度、学术聚讼,乃至人际关系等多方面的问题。

<sup>1</sup> 黄翼 1942 年 8 月 27 日致周先庚信函。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周先庚档案,北京: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馆藏基地,档案编号:XJ-001-030,该档案中部分信函所标注时间不尽准确,本文中所涉及信函的标注时间已经过作者详细考辨。后文中引用信函只注档案编号。

<sup>2</sup> 黄翼 1943 年 12 月 24 日致周先庚信函。档案编号:XJ-001-017。

<sup>3</sup> 黄翼 1942 年 8 月 27 日致周先庚信函。档案编号:XJ-001-030。

1942年1月,黄翼收到吴有训转来的审稿意见函,该函从几个方面批评了黄翼的稿件。首先,从整体结构和文字表达方面,稿件存在着绪论、方法部分过于简略,数学公式部分陈述过多的问题,一些英文词使用欠准确,一些图表可以删减;其次,在数据有效性方面,存在被试人数偏少问题,第一篇报告仅有包括作者本人在内的4名被试,知道实验目的的作者本人作为被试会影响实验结果的客观性。这两篇报告因系“初步之实验”,审稿专家建议如果能多做些实验,获得确切结果后再发表则更好些;再次,对前人研究文献的引用不够充分。另外,这名审稿专家还指出这两篇文章可以合成一篇文稿<sup>4</sup>。在审稿意见函的末尾,主编吴有训没有明确拒稿,而是表示“上述各点,敬请参考为荷”。

### 3.2 黄翼对《科学纪录》评审意见的回应

黄翼随即给吴有训回信对审稿专家的意见一一进行回应。吴有训转达审稿意见函的信件写于1942年1月14日,黄翼写给吴有训的信所署时间是1月23日,考虑到当时交通与邮件运递状态,黄翼应当是接到吴有训信件后随即就写了回信,其投稿受挫后情绪反应的程度可见一斑。这封信件是黄翼寄给周培源由其转交吴有训,并请求同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周先庚阅读他写的数页对评审意见更为详尽的回应,希望得到对其研究报告更为公正的评价。周先庚档案文献中保存着一份周先庚撰写的审稿意见,总体上是倾向于肯定黄翼的稿件,并且还写了一份关于审稿流程和规则的建议。由这份资料的内容来判断,应该是写给吴有训的。

面对审稿专家的评审意见,黄翼从学术评判标准、专家权威性、分歧的解决途径、科学研究的学术与社会环境制约性等为自己的研究报告进行了辩护。

#### 3.2.1 学术评判的标准

黄翼认为评价一篇研究报告要考虑研究的创新性、数据有效性和文体等方面进行审查,而且要分别赋予不同的权重。他曾写道:“校者对于诸点(贡献)及其理论解释校阅时所最应注意者,全未理论。仅能就体裁、详略、及文字俗雅等不关痛痒之末节,凭主观之好恶,作不合理之武断,亦校阅史上之创例也。”<sup>5</sup>在自己实验数据方面,黄翼不否认其研究被试的样本小,但是他认为样本大小并不是绝对的评判标准。他说“校者谓初试人数太少,不应发表。

查材料至何种程度方有发表之价值,要当视结果之‘可靠度’为准”<sup>6</sup>。他进而解释说大部分心理学研究只能获得比较小的数值差异,因此必须有大的样本来确保结果可靠。但因自己研究的数据差异显著,故并不需要大样本。

#### 3.2.2 评审权威性

黄翼说,出于篇幅考虑,自己在绪论中尽量采用专业术语和简约的词语来点出理论内涵,没有相关学术背景的人也许读不懂,但是对于专业人士来说是不成问题的。黄翼反复强调,自己文章是“启发前人未及之贡献”,而“校者似全未领会”。另外,黄翼认为自己两篇文章之间的区别已经足够大了,“惜校者未能鉴别”,才提出要求把两篇文章合并成为一篇。黄翼的形重错觉研究是遵循格式塔心理学研究路线,而当时国内开展格式塔实验研究的心理学家寥寥无几。这个时候,黄翼还不知道是谁审阅了自己的稿件,但是他试图说服主编,表明这个审稿人并没有足够的专业资格来评阅自己的文章。在这个例子里,当出现学术争论的时候,黄翼采用专业分工的视角来决定谁有批评和判断的话语权。

在质疑审稿人学术评判权威性的同时,黄翼借助自己的权威来证明其学术和语言功底。黄翼提到,自己的“原稿曾经鄙校同事校读,未见有辞不达意之处。惟所述既涉专门,自须有相当基础者,方能理解。”针对审稿人对他英语写作的批评,他说“鄙人亦曾在国外发表研究,文字一端从未遭如此荼毒”<sup>7</sup>,言下之意,如果自己曾经有能力在国外用英文发表文章,那么现在的语言也不应该出现大的问题。

黄翼向吴有训表达了对同行评审的看法:“窃思,贵刊审查其他大学专门教授稿件,所委校阅人自必确系大师硕学,在国外专门期刊多有发表实验文字经验,具有鉴别眼光者。此次情形,殊出意外。以后似可并聘两人以上分签意见,较为稳妥。”<sup>8</sup>可以看出,黄翼很看重同行评审的准入门槛,以及不同学者之间意见的一致程度。当外聘审稿人的意见和自己的意见有很大出入的时候,黄翼对外聘审稿人的意见以及其学术功底产生了质疑,并进一步要求改进审稿程序,希望得到另外一位审稿人的评审。很明显,黄翼暗示周先庚可以做第二审稿人。

#### 3.2.3 分歧的解决途径:诉诸权威先例

在审稿人与投稿人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黄翼

<sup>4</sup> 吴有训 1942年1月14日致黄翼信函。档案编号: XJ-001-018。

<sup>5</sup> 黄翼 1942年1月致周培源转周先庚信函。档案编号: XJ-001-020。

<sup>6</sup> 黄翼 1942年1月致周培源转周先庚信函。档案编号: XJ-001-020。

<sup>7</sup> 黄翼 1942年1月23日致周先庚信函。档案编号: XJ-001-019。

<sup>8</sup> 黄翼 1942年1月23日致周先庚信函。档案编号: XJ-001-019。

还采用“诉诸权威先例”的方式来解决学术分歧。针对审稿人批评他的样本小,黄翼则提出索利斯(R. H. Thouless)的研究只用一个被试,乌兹纳泽(Usnadze)的研究只用了6个被试。至于拿自己做被试的先例,则有艾宾浩斯的记忆研究。针对审稿人批评他使用字典中并没有收录的“lawful”这个形容词,黄翼解释,既然美国心理学家格塞尔在文章中如此使用过,那么他自己使用lawful自然也就行得通了。审稿人还指出黄翼写的“Has told us”和“a risky affair”太过于口语化,不应该用在学术文章之内。黄翼回应称,威廉·詹姆士还曾经写过“*There aren't such animal*”<sup>9</sup>这样的句子,那么,如果詹姆斯读到这位审稿专家的意见该有何感想呢?<sup>10</sup>显然黄翼在这里是运用著名心理学家的权威先例来质疑审稿专家的评审意见。

### 3.2.4 学术环境和社会环境制约性

在以上讨论当中,黄翼认为问题不是出在自己文章,而是审稿人的学术能力和审稿行为没有遵守学术规范,再就是审稿流程不完善,以至于自己的文章不被认可。在另外一些讨论里,黄翼也承认了自己文章存在一些瑕疵,但是这些瑕疵是不可避免的,它们是学术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产物。

针对审稿人认为自己文章详略不当的意见,黄翼指出,《科学纪录》要求每篇文章不得超过1500外文单词,因此自己不得不“集中于实验事实而尽量牺牲导言、讨论、历史、撮述等项”。关于数学部分过于详细的评论,黄翼说:

详略之说,大抵视读者之素养而定。凡基础智识太差之部,则常觉简不达意,其较熟悉之部,则易觉其详。写作者如父子携驴过街,何能画满街人之望。鄙意以为一般读心理学文字者,数学常不甚纯熟,本文重要之部分,宁失之详。——况太详太略,何足以定科学文字之取舍,要在其学术价值何如耳。<sup>11</sup>

在这里,黄翼暗示科学研究报告的形态并不是完全由研究者本人决定的——读者的知识背景也需要考虑在内。不存在一个完全客观或者绝对正确的方法来写作科学报告;实际上,科学写作是存在于主体间性的实践——受到作者和读者共同的主体性的影响。如果说《科学纪录》的征文标准是一个历史上的具体事例,而在另外一次征稿或者另外

一个期刊上可以轻易改变,这种主体间性对于科学写作的影响在其他历史年代中也必然存在。在当代心理学领域,作者投稿时也常常会考虑到期刊和读者的定位及偏好。

接下来,黄翼又指出,自己的研究不仅仅受到学术环境的限制,还受到了更广义的社会环境的限制。针对审稿人批评他引用前人相关文献不充分,黄翼解释称自己这样做,一是因为《科学纪录》在字数上的限制,二是因为抗战期间文献不全,自己为此也非常苦恼。在写给周先庚另外一封信中,黄翼提到,中国存有的外国文献摘要库本身就不全,在这个文献库里,他找到30多篇文献和自己研究相关,但是能真正阅读到全文的只有6篇<sup>12</sup>。当时黄翼还面临着缺乏实验仪器和助手的问题。在好几封信里,黄翼一直请求周先庚为自己寻找得力的研究助手,而最终无果。从1940年中期,黄翼就开始想办法定制实验用的铜制空心圆柱体,直到1942年中期,这些定制的仪器还是没有完成,他不得不自己动手来制作仪器。

## 4 周先庚从中调解

1942年1月,周先庚收到从周培源处转来黄翼对审稿意见的回应之后并没有马上给黄翼复信。4月22日黄翼给周先庚写信时再次提到自己研究报告一事,称:

原意以为此问题所需用品较为简单,故贸然动手,不意为时两年而需要之简单物品至今未备,再受助教问题及文献不足之牵制,更感障碍重重,不胜奥闷,但思创作难而批评多,终不能束手无所事事,故仍拟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着着进行。上番报告乞不吝赐教,该文一味求简单,殊未将理论的见解及计划要点述出,如蒙垂注,当再有所请教也。<sup>13</sup>

周先庚对黄翼研究报告进行评阅时也遇到读不到相关文献全文的困难,只能根据一些摘要判断其内容。后来黄翼了解到审稿人是汪敬熙,遂对其表达出极度不满的情绪。他再次向周先庚和吴有训解释自己的文章,并拒绝修改,此次《科学纪录》投稿风波遂不了了之。

### 4.1 周先庚的评论

总体来说,周先庚对黄翼两篇文章的价值是认可的。需要注意的是,周先庚此时处在一个敏感的

<sup>9</sup> aren't 属于复数形式,而后边连接的 animal 是单数形式;这种不规范的用法在美国南部黑人区比较常见。

<sup>10</sup> 黄翼 1942 年 1 月致周培源转周先庚信函。档案编号: XJ-001-020。

<sup>11</sup> 黄翼 1942 年 1 月致周培源转周先庚信函。档案编号: XJ-001-020。

<sup>12</sup> Letter written by I. Huang to Siegen K. Chou, August 25, 1942. 档案编号: XJ-001-031。

<sup>13</sup> 黄翼 1942 年 4 月 22 日致周先庚信函。档案编号: XJ-001-023。

位置：一方面黄翼是自己同窗多年的好友，另一方面作为审稿人的汪敬熙，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属当时心理学界的学术权威人物，所以周先庚的措辞比较谨慎。我们找到两封周先庚于1943年11月写给汪敬熙的信，其内容几乎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是一封为草稿，带有浓重的涂抹修改痕迹，另一封是一笔一划小心誊写的<sup>14</sup>。由此可以想象得出，周先庚实际寄送给汪敬熙正式信函中的书写会是多么工整。信里谈到的都是公事，不像他写给黄翼的信那样很随意地闲谈个人生活情况。

关于研究创新性的价值问题。周先庚认为黄翼的研究有价值，称“‘Size-Weight function’(not illusion)<sup>15</sup>，所见极是，似是前人所未发，应明白指出，并略述之，以引读者注意”<sup>16</sup>。接下来，周先庚称黄翼的研究在目的、系统性和详细性上都和索利斯的研究不同，暗指汪敬熙不应该把两者混为一谈，但黄翼在写作上也给读者带来了不正确的印象。这样既肯定了黄翼的研究成果，又顾及了汪敬熙的权威性。即使黄翼的研究和索利斯有相似的地方，周先庚认为，索利斯的文章仅仅简单提到形重错觉，而黄翼第一篇文章把这个题目“特别抽出再详细系统作之。所得之结果，不问在图表或方程式方面，均应有更确切之说明”。他继而点评道，“关于第二篇，作者将各因子系统变换之，于同一情况下，用更完备妥善之方法实验，所得图示结果，包括曲线四五条，可以同时比较，且可与前人所得者比较，退一步说，即是该因子等尽为前人所试过，作者此种复式图示，自为积极之贡献。”<sup>17</sup>

针对汪敬熙审稿意见中关于实验人数的问题，周先庚指出“此实验中人数不多，然人数的若干始为够多亦无定论”，他援引外国心理学家的观点解释称重点不在于人数多，而在于在少数人身上做多次观察。这里我们需要补充一点，在被试人数问题上的争议可能跟个别心理学家的研究领域有关系。黄翼做的格式塔心理学研究自然可以在少数人身上做多次观察。

在统计方法的问题上，周先庚也表达了主体间

性的观点。他说：“统计方法多被人批评为用来 twist data 之办法，故除常见之公式外每每加以解释以免误会。但如阅此文者均有相当根底，则当然可以略去。”<sup>18</sup>我们发现20世纪40年代初心理学家对统计方法的观点和现在有不小的差别。现代统计方法的广泛流行致使学者们不再需要对其利用加以过多的说明，但是似乎人们有时也会忽视统计数字对于原始数据潜在的扭曲。

在英文写作上，周先庚也顾及到了汪敬熙和黄翼两个人的感受。他说“唐人说洋话作洋文，总难完全像洋人，即令受人恭维备至者亦不能免偶有缺点或不道地之处。洋人之洋文亦不见得完全典雅。科学论文目的在求达意无误。要求文章好，只得另请文学高明指教，同处科学立场者似不必兼顾文学修辞。”<sup>19</sup>

在这封审稿意见函的后面，周先庚还附有一纸为主编出谋划策，提出了几条审稿规则的建议。首先是，如果文章被录用发表，那么一个审稿人就够了。但是一旦产生异议的话，那么需要有三个审稿人，至少有一个人是内行。黄翼曾建议两个以上的审稿人，周先庚则建议三个，自然是考虑到三个人之中可以产生二比一的多数投票决定。关于修改意见，周先庚提出，一旦文章被录用，小地方的改动可以由审稿人代笔；但是如果文章被退稿，审稿人要另附纸张向主编笼统说明原因，不应该在原稿上批改，更不该用红色墨水在原稿上注释，言下之意是要考虑到作者的感受。

## 4.2 黄翼的回复

黄翼收到周先庚的评审意见之后，写了一封非常长的英文信件(约2300单词)作为回复。他对自己之前的激烈反应感到有些歉意，解释说，刚收到汪敬熙的评论意见时，自己有些情绪化，再加上自己的同事陈立(卓如)鼓励他予以回击，所以才写信给吴有训进行申诉。现在自己打算放弃在《科学纪录》上发表文章，并且已经在着手搜集更多的数据。但是，因为周先庚已经在吴有训那里推动此事了，他又不得不继续解释自己的文章。其中部分内容重复了之前的观点，我们不再赘述，只选择一些在黄翼和周先庚之间形成对话的内容进行讨论。

创新性是不是评审科研成果的绝对标准呢？周先庚认为不是。他说，在第一篇文章里“作者完全证实 Thouless 之实验，则属无可疑义者”。言下之意就是说，就算没有创新性的话，那么重复验证结

<sup>14</sup> 周先庚1943年3月24日致汪敬熙信函。档案编号：XJ-001-055。

<sup>15</sup> 周先庚试图把“错觉”(illusion)一词更正为“功能”(function)，实际上“illusion”是格式塔心理学的关键词汇；黄翼并没有采纳这一建议。周先庚为何做出这一修改，目前还无法做出判断。不过周先庚对格式塔心理学也比较熟悉，1927年6至8月，他和黄翼共同参加过考夫卡在伯克利大学暑期学校中开设的格式塔心理学课程。

<sup>16</sup> 周先庚撰审稿函(草稿)。此件应是寄送吴有训信函的部分草稿，由周先庚之子周广业个人收藏。

<sup>17</sup> 周先庚撰审稿函(草稿)。

<sup>18</sup> 周先庚撰审稿函(草稿)。

<sup>19</sup> 周先庚撰审稿函(草稿)。

论也是有意义的。这一点得到了黄翼的认可,他说“①甚至完全重复也不是毫无价值的;②每一个人都会在研究里留下自己的影响,把自己和他人的方案区分开来。”<sup>20</sup>细读之下,我们发现黄翼的第一个论断反映出了逻辑实证主义的“重复论证”观点,而第二个论断则呼应了一个接近于社会建构论的观点,即研究者对实验的操作和观察会影响研究结果。第二个论断实际上暗示彻底的重复论证是不可能的。很遗憾黄翼没有在信中对这两个彼此冲突的观点进行深入阐发。

在黄翼眼里,他认为自己的创新不仅仅在于结果、方法、方程式和因子,更重要的是理论整合。他说自己对形重效应本身及其与知觉恒常性现象的关系并不是很感兴趣,而是希望自己能够解释形重效应的功能关系以及恒常性同属于一类事物。并希望得出一系列与之相并列的定律。从理论上来说,黄翼认为,恒常性(constancy)和回归性(regression)两个概念是一个更为概括性的规律的应用,自己所提出的规律可以将恒常性和形重效应统摄于一起。黄翼称自己已对这个“联合决定法则”(law of joint determination)思考多年,并一直认为自己具有原创性,但令其感到失望的是,他在索利斯的论文摘要中发现了与自己完全一样的观点。如果我们考虑到黄翼的创作过程,可以说黄翼是有创新性的,因为他独立提出了新的观点。但是按照学术规范而言,首创性是属于索利斯的,因为他最先提出了这个观点。这样的学术规范对于由于战乱或者发展落后而出现文献检索困难的研究者来说,是不公平的。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学术界对于这种情况会给予一定同情的,比如说牛顿和莱布尼茨同时发现微积分是被广泛承认的。周先庚也曾建议黄翼“既已证实其与 Thouless's index 相等,则不妨明言独立证实其正确,但二式之符号,及所根据之事实,材料之完备性不同。”<sup>21</sup>

从周先庚给黄翼的建议里可以看到,创新性不仅仅要求社会认可,并且也可以受到作者行文的影响。周先庚提出,黄翼在一些地方过多地引用别人的成果和建议,没有凸显出自己的学术贡献。黄翼回应说,自己还是觉得有必要指出前人相关的工作,以及致谢同事给自己提出的建议。在这里我们看到,引用前人文献处在一个类似两难的情景当中:过多的引用会掩盖作者自己的创新性和独到的贡献,而

过少的引用涉及到学术诚实的问题。至于多少引用是妥当的,并没有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黄翼和两位审稿人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之间不仅仅有分歧,同时也存在着对话的可能。尽管黄翼对汪敬熙的审稿意见非常不满,他还是接受了汪敬熙的批评,决定在文章脚注中向索利斯表达敬意以慰良心。黄翼为什么这样呢?第一,他的学术良心驱使他承认前人已有的成果。第二,黄翼考虑到“稳妥”的问题。黄翼在信中曾提到,为慎重起见,当他在国外期刊上发表文章时可以通过引用索利斯来避免自己在原创性上的暗示。当一篇学术作品发表之后,它要经受领域内很多专家的审阅,这些专家不一定像周先庚那样对黄翼的作品抱有太多欣赏和同情。考虑到未来的读者群体——国外的心理学者,黄翼决定听取审稿专家汪敬熙的批评意见去引用索利斯。当黄翼处在一个创新性不明确的情境当中,他认为与其突出自己的创新性,同时却面临潜在的批评,不如采取比较稳妥的策略来保证万无一失。

黄翼是在收到周先庚的信件之后,才了解到汪敬熙是《科学纪录》的审稿人,并称这也打消了自己所有的疑虑,因为从人格和成就上来讲,汪敬熙与审稿意见中那个无人能比的形象是相吻合的。黄翼认同周先庚的这个说法:称呼汪敬熙为心理学家(psychologist)只能说“污染了规范的英文”(polluting the King's English)的说法<sup>22</sup>。黄翼重申了汪敬熙并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来审阅自己的稿件;他称汪敬熙似乎对恒常性问题和心理物理学方法一窍不通,对心理学问题的认识相当幼稚。黄翼称生物系的一个同事曾说过,在中国被称为心理学的大部分内容实际上仅仅是生理学化的东西。可见,黄翼在批评汪敬熙的同时,顺带把中国当时对生理心理学的追捧也嘲讽了。当然,这里有必要指出汪敬熙是在国内外均有重要影响的心理学家之一,其人品和学术水平应该从历史角度公允看待,不能由个别同事的评语而下定论<sup>23</sup>。

<sup>22</sup> Letter written by I. Huang to Siegen K. Chou, August 25, 1942. 档案编号: XJ-001-031。

<sup>23</sup> 汪敬熙(1893~1968),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健将,1920年赴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留学,由文学者逐渐转型走上科学研究道路。1927年受聘中山大学,在中外权威期刊相继发表9篇研究报告。1932年转任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1933年发表《中国心理学的将来》一文,引起国内心理学界的大讨论。1934年被聘为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所长。1944年再赴美国开展研究。1946~1948年在国内工作,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同年经李约瑟推荐,接替其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处国际科学合作组主任(阎书昌,2015a; Zheng, 2013)。

<sup>20</sup> Letter written by I. Huang to Siegen K. Chou, August 25, 1942. 档案编号: XJ-001-031。

<sup>21</sup> 周先庚撰审稿函(草稿)。

## 5 转投国际学术文化资料供应委员会再次受挫

在写给周先庚的英文信件中,黄翼称自己并不是很清楚他能够跟汪敬熙讲什么,“如果汪敬熙还是坚持自己的数据太少的话,那就权当他是的吧”<sup>24</sup>。显然,黄翼对《科学纪录》已经不再抱任何希望了。随后一年的时间里黄翼补充了更多被试,完善了自己的实验,完成了两篇英文研究报告的稿件,分别是“形重错觉与知觉恒常性的关系”(The size-weight illusion in relation to the perceptual constancies)和“形重错觉和‘重量密度错觉’”(The size-weight illusion and the “weight-density illusion”),黄翼将它们投给了当时的国际学术文化资料供应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教育部、美国大使馆和中英科学合作馆合办,是战时接受和分发美英两国科技书刊的主要机构,同时也将国内最前沿研究成果寄送美国发表。出人意料却又情理之中的是,这两篇文章又被送到汪敬熙手中进行评审。很遗憾,汪敬熙的审稿意见我们没有找到。这件事是黄翼于1943年底写给周先庚一封信里提到的,摘录如下:

近日有大气闷事,方欲向兄报告。弟去年底投寄《科学纪录》之短文,材料太少,不发表甚无话讲。事后穷一年之力,成历史评论及实验报告各一篇,都英文三万言。不敢云佳,却为弟最仔细之工作。闻重(庆)、广(州)“国际学术文化资料供应委员会”(袁同礼主持)征求论文寄美发表,每篇录取者给酬金一千五百至或二千元,遂多眷一份应征。该会送请“专家”审查,该专家撰有‘批评’一纸报会,对弟文极力诋毁。专家何人?乃汪敬熙是也。该会仍将弟文(二千元)录取,唯声明须照“专家”意见改作。弟细读批评,狗屁不通,遂复函该会,放弃稿酬,拒绝改订,请其原稿退还。该稿已另行寄美。将来如接到该稿,拟将副本邮寄吾兄处及中央大学等处诸同道,附汪公意见书传览,未知吾兄赞成否。此公盘踞要位(中央研究院),中国心理学永无出头之日,何日得“收复失地”为快。<sup>25</sup>

主持国际学术文化资料供应委员会工作的袁同礼是图书馆学家,他本人不懂心理学,收到黄翼的投稿之后,需要寻找知名心理学家来审稿。国际学术文化资料供应委员会是一个顶级的学术交流

机构,那么袁同礼找时任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所长汪敬熙审稿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只是他没有料到黄翼和汪敬熙这两个人之前已经因为这组稿件出现过“矛盾”。当下我们有些期刊是允许作者选择回避某些审稿人的,但估计当时国际学术文化资料供应委员会的审稿程序不包括这一个考虑。从黄翼信中的措辞和语气不难看出,黄翼对汪敬熙的批评意见非常恼火,尽管自己很需要经济支持,但是他一怒之下将两千元国币的酬金放弃了。

周先庚对黄翼第二次稿件被拒是否发表过意见?很遗憾,我们没有找到相关的信件,无从判断。但是周先庚学术档案中保留着黄翼研究报告修订版的打印稿,第一篇稿件34页,第二篇38页,上面有一些校改性的英文词。两篇稿件的正式发表文本中多已采纳了这些意见,可见周先庚在当时还是非常细致地校读了黄翼的稿件,这也反映出周先庚对它们的肯定态度。我们还发现,周先庚在这个阶段开始考虑中国心理学界的人事和学术共同体的问题。在一封给黄翼的信中,他提到:

一切学术运动,非三五真正同志有计划鼓吹、努力提倡不可。吾人每每轻视政治人事,然则学术之政治成分、人事问题,亦难避免。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报》之第二次失败。我之南京打击乎,十二分昭示吾人:心理学家太无团结。此所谓团结,非仅指大多人之团结,即三五同年同学之团结,亦是少见。各走各路,互不佩服,消极抵抗竞争,结果自然不如政治风度丰富之学科。善用时机,迎合一般社会需要,而出路前途无限。<sup>26</sup>

## 6 美国《普通心理学期刊》发表黄翼遗作

1943年底的黄翼已经是贫病交加,处在极其困难的境地。中央大学艾伟曾邀请黄翼去重庆做演讲,但他因垫付不起旅费,而不敢出行。为了补贴家用,黄翼不得不搁置自己手头的研究项目,去做自己痛恨的翻译工作来挣钱。这时黄翼的心境非常凄凉。他在给周先庚的信里讲“此间绝无抗战工作之机会”<sup>27</sup>;对内则仰汪敬熙等辈鼻息,日月蹉跎,老将至矣”。同时,黄翼又因几年来研究的迟滞和汪

<sup>24</sup> Letter written by I. Huang to Siegen K. Chou, August 25, 1942. 档案编号: XJ-001-031。

<sup>25</sup> 黄翼1943年12月24日致周先庚信函。档案编号: XJ-001-017。

<sup>26</sup> 周先庚1942年8月中旬致黄翼信函。由周先庚之子周广业个人收藏。

<sup>27</sup> 周先庚自己当时参加了中美心理学家合作开展的抗日情报伞兵突击队员选拔心理测评(参见阎书昌,陈晶,张红梅,2012;阎书昌,2015b),他可能曾经向黄翼建议去寻找些这方面的工作机会。



敬熙的批评产生了危机感, 希望尽快发表手里现有的文章, 以“将信誉略为恢复, 否则此后更无出声之余地”。于是, 黄翼把自己两篇形重错觉研究的文章投给了美国《普通心理学期刊》。为什么选择美国呢? 他的文章均以英文写作, 投稿到英语国家的期刊再自然不过; 他曾在美国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 对美国心理学界比较熟悉, 又有可能获得自己导师格塞尔的支持。虽然格式塔心理学发源于德国, 但是此时格式塔学派几位核心学者已经移民到了美国。或许黄翼也考虑到美国会有更多研究者赏识自己的研究。需要指出的一点是, 黄翼做出这个选择, 并没有抱着崇洋媚外的心态, 而是因为“国人并无鉴别能力, 只知以美国人之意见为意见”<sup>28</sup>。他于 1943 年底将两篇研究报告投寄到了美国, 最终它们同时发表于《普通心理学期刊》第 33 卷第 1 期。

### 6.1 黄翼两篇研究报告的内容

第一篇文章题为“形重错觉与知觉恒常性的关系”, 它是侧重理论综合分析与研究方案构想的评论性文章。形重错觉的传统理论解释中, 弗卢努瓦(Flournoy)假定存在一种遗传倾向, 无意识脑冲动会据其自动调整而产生错觉。也有研究者提出定势说, 是预期或者说无意识推理产生了定势进而产生错觉。黄翼指出了弗卢努瓦理论解释的内在矛盾性, 并提出利用当时最新出现的肌电图记录技术(electromyographic technique)开展研究(构想 1)。乌兹纳泽提出两种类似的错觉, 即体积错觉和压力错觉, 黄翼认为需要在被试蒙眼条件下(构想 2)以及将铁球置于电磁铁上方的方法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构想 3)。黄翼特别指出, 乌兹纳泽强调两个物体之间被知觉到真实差异才导致错误的知觉, 因此他提出让被试手提一物体, 下系另一个看不到的物体, 以此检验形重错觉是否受所看到的大小差异的影响(构想 4)。黄翼认为索利斯将知觉恒常性与形重错觉联系在一起的观点富有启发性, 但是恒常性是靠全部感知素材实现的, 而形重错觉中是对比影响了实际知觉, 并表现出有悖于预期的性质。针对这一矛盾性, 黄翼提出给被试一对重量与外表(external appearance)相同但大小不同的物体, 其中一个重量设定为 100 单位, 让被试通过反复提举来估计另一个的重量。然后再通过心理物理法改变被估物体重量直到看上去与 100 单位物体相同, 最后

比照两组数据是否存在一致性(构想 5)。黄翼反对索利斯将形重错觉指数与恒常性指数相比较的做法, 因为所知觉到的大小易表现出恒常性, 而所知觉到的重量易表现出错觉性, 重量错觉实际上是重量的非恒常性, 亦即恒常性可视为错觉性的对立面。他提出利用杠杆工具开展研究, 若物体的现象性重量(phenomenal weight)并不是完全决定于杠杆物理原理而相当程度上决定于其实际重量, 就可以认为出现了重量恒常性现象(构想 6)。黄翼还提出将恒常性研究中实验技术运用于错觉效应度(degree of illusory effect)的测量(构想 7)。黄翼认为应该研究视重量(apparent weight)与大小之间的函数关系, 可以设定一个重量、大小固定的物体, 然后用大小不同而重量相同的物体与之进行比较, 以此获得代表某一视重量的曲线, 通过大小、重量的改变, 最终将形重领域内的曲线都勾勒出来(构想 8)。黄翼利用自己初步研究的实验数据阐释大小线索(size cues)减少以及空间感的作用问题, 并提出对在没有感觉线索情况下物体大小方面的知识所产生的效应予以深入的研究, 如将触摸肌肉运动知觉线索(tacto-kinesthetic cue)取消掉以及控制物体重心的影响(构想 9)。前人研究发现影响视大小(apparent size)的因素也会影响视重量, 如颜色、形状, 在恒常性领域存在着伍德沃斯所称的照明伪性线索(deceptive cues of illumination)。黄翼提出体积不同的两个球或立方体所产生的形重错觉要小于体积差别相同的两个圆柱所产生的错觉(构想 10), 另外还可以检验在仅给被试呈现物体阴影情况下是否导致视大小与实际大小之间相悖的情况(构想 11)。在视重量和视大小之间关系的问题上, 黄翼提出让两个物体仅在一个维度上变化, 使其中一个看上去是另一个的两倍大, 检验重量错觉的量值是否决定于心理上的大小差异(构想 12)。黄翼进一步评述了知识、观察态度、实践、遗传发育对形重错觉和恒常性的影响, 还提出在动物身上检验形重错觉存在与否的问题(构想 13)。最后黄翼提出, 对形重错觉效应和知觉恒常性之间关系的认识不能停留在索利斯的解释上, 应该引入格式塔心理学家考夫卡的理论。考夫卡对知觉恒常性的解释中有两个原则, 一是不变性, 二是正常或特例(the normal or unique case), 并提出动力学理论以解释大小、形状恒常性。黄翼自己开展的实验研究就是将考夫卡第一个原则运用于形重现象的解释, 同时他认为其第二个原则也能运用到重量现象上。黄翼指出, 形重

<sup>28</sup> 黄翼 1944 年 4 月 16 日致周先庚信函, 由周先庚之子周广业个人收藏。

错觉的传统理论解释基于原子论，总是试图独立出刺激各变量所产生的知觉的各个方面，而当下应该尝试了解知觉流形(perception manifold)不同方面的动力性相互依赖。他认为形重错觉的解释应该在它与恒常性的关联中寻找(Huang, 1945a)。

第二篇文章题为“形重错觉和‘重量密度错觉’”，在索利斯和乌兹纳泽的研究基础上，黄翼提出用实验方法检验是否存在可测量的密度感(sense of density)，如果存在的话，它是否受到物体绝对重量的影响。他要求40名大学生被试在一种实验条件下对大小不同的物体进行重量比较，在另一种实验条件下对大小不同的物体进行密度比较。黄翼将所得的形重错觉和密度错觉实验数据进行了诸如曲线拟合、数量化、差别阈限、自我相关、个体差异、交互相关等多方面的分析，最后他认为实验证实了密度感的存在，并且物体绝对重量影响着被试对密度的印象，而且这种影响所承载的稳定关系可以通过数学公式精确地表述出来。黄翼指出传统的心理学可能难以接受这种密度感的存在，但是当下心理学思想中借助“先验原型”(piori objection)概念可以予以解释(Huang, 1945b)。

可以看得出，前一篇文章重在理论构想，后一篇针对特定假设进行实验探索，的确各成一章<sup>29</sup>。如果我们承认提出学术问题本身就是创新的话，那么黄翼在一篇长文中提出13个研究构想，无疑反映出这篇文章本身在当时学术环境下的创新性和启发性。尽管黄翼前期曾反驳汪敬熙的观点，认为实验被试数量小不成问题，但他最终将实验人数进行了补充，第一篇文章提到的一项初步实验被试人数为10人，第二篇文章中被试人数达到40人。另外，黄翼也是十分审慎严谨的，以脚注的形式声明自己因战争的缘故，可能无法全面回顾以往的学术文献，尤其是德文文献。在他的两篇文章完成之后才偶然获得某位研究者的一篇论文和另一位研究者的一篇论文摘要，他便保持自己文章全貌未动，将这两篇新文献的内容以附录形式列在第二篇文章的末尾。另外，他两篇文章所列的参考文献中有6篇论文没有看到原文，他均一一注明。据谷歌学术显示，这两篇文章至今被引用39次，自2011年至今这两篇文章被引用达到6篇次<sup>30</sup>。

## 6.2 格塞尔对研究报告发表的推动作用

黄翼的文章虽然发表在1945年卷，但实际发行时间为1946年1月1日，战争时期学术期刊出版时间延宕是较为常见的事情。我们无从知晓黄翼的导师格塞尔把这两篇文章推荐给美国《普通心理学期刊》发表的过程。但是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在正式发表的两篇文章首页下方均有一行几乎相同的说明性文字：“经由国务院从中国递交，由编委会的阿诺德·格塞尔博士录用刊发，编辑部于1943年12月3日收稿。”这一段注释很不同寻常。通常来讲，期刊只会注明文章接受日期；按惯例接受文章发表是整个编辑部的决定，因此并不会特别标明是个别编委会成员的决定。我们浏览了《普通心理学期刊》同一时期发表的其他文章，它们都遵循着这一惯例。但是为什么在黄翼的稿件上出现特例了呢？我们认为存在一种可能，就是格塞尔当时在美国心理学界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并且他恰好是该刊编委会成员，于是他借助自己的学术权威推动了黄翼文章的发表。编辑部其他成员对于格塞尔的个人决定应该不是完全同意的，否则不会添加这个标注，而这个不太起眼的标注就成了一个重要而微妙的细节。

按严格的学术标准来讲，格塞尔作为黄翼的前导师，他是不应该审阅并且接受黄翼稿件的。格塞尔作为有经验的学者，同时还是编委会的成员，不应该不了解这一个学术惯例。那么他为什么会力推黄翼的文章呢？一种可能性是，格塞尔在痛失爱徒的心情下推动了黄翼文章的发表。黄翼因胃癌于1944年10月18日去世。格塞尔通过电报收到这一噩耗，随即动笔写了一篇讣告发表在《科学》杂志上。从这篇讣告里，我们可以看出格塞尔非常欣赏自己昔日学生的天赋、努力和成就，对他的去世感到非常悲痛和惋惜。格塞尔还专门用了一段文字来描述黄翼在战时恶劣的生活状况和工作环境，对他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学术研究表示了钦佩。但是这种推测存在一个疑点。我们经过检索发现，黄翼自1943年之后发表于美国《遗传心理学期刊》(*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和《普通心理学期刊》的7篇文章都有类似脚注，即均注明是由格塞尔接受录用的。其中6篇稿件由编辑部所注收稿时间是1943年5月或12月，实际刊出时间最早者是1945年2月，最晚者是1946年1月，都是在黄翼去世之后。另外一篇文章“儿童关于物理因果关系的概念：批评性总结”(Children's conception of physical causality:

<sup>29</sup> 从长度来看，第一篇20页(约7500个单词)，另一篇21页(约8700个单词)。

<sup>30</sup> 2017年1月23日获取资料。

A critical summary), 是 1944 年 3 月 1 日发行的, 而黄翼是 1944 年 10 月去世的。也就是说, 这篇文章发表在黄翼去世之前。我们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 格塞尔在黄翼生前就已经重视推动其国际交流, 支持抗战期间中国心理学家研究成果的发表, 并且在痛失爱徒后, 加倍努力推动了他遗作的发表。

自从抗日战争爆发后, 黄翼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每况愈下, 缺少科研文献、实验设备和助手, 但即使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 黄翼仍坚持研究不辍, 于 1943 到 1946 年间相继在美国权威期刊发表 9 篇文章。让人扼腕痛惜的是, 当战争行将结束, 学者们的生活即将好转的时候, 黄翼已经罹患胃癌并一目失明, 正值 41 岁壮年却离开了人世。他为之呕心沥血的两篇文章终于发表, 算得上是绝笔之作, 可惜他并没有等到文章发表的那一天。

## 7 评论

黄翼两篇形重错觉研究报告与西方心理学的研究构成了交流和对话, 而不是将西方心理学引介到中国的移植性工作, 这一点在抗战时期中国心理学发展受到极大损害的背景下显得尤为可贵。作为正式发表的文献, 用任何单一维度的价值观念去评价它可能都是不公允的, 唯有历史和科学自身才可以承担起这份责任。本文以微观历史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方法与视角呈现并解读了黄翼研究报告曲折的学术生产过程, 通过对黄翼、汪敬熙、周先庚、吴有训之间直接或间接的学术互动的分析, 探讨抗战时期心理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学术评价、人的因素、学术环境与社会环境因素等方面。

### 7.1 知识生产的学术评价

黄翼两篇研究报告的评审风波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学术评价, 其中包括创新性的评判与确认, 学术评价的规范与学术争端的解决等问题。原创性无疑是学术进步的基础。前文中提到汪敬熙似乎强调黄翼的思路已被前人涉及进而否定他的创新性, 黄翼则强调自己思路提出的独立性, 而且是以自己的方法进行了独立论证, 并证实了前人的结论, 同时也强调自己在理论解释层面的创新被忽视了。研究报告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新问题、新方法和新结果上, 显然在某些方面黄翼研究报告本身并不占劣势。在这里, 一方面是汪敬熙没有降低学术评价的标准, 另一方面是黄翼不懈地追求着创新, 只是双方侧重点不一致, 而导致了学术冲突。我们认为这个侧重点的区别体现了心理学分支之间的

差异: 汪敬熙代表的生理心理学侧重大样本, 而黄翼代表的格式塔心理学对样本要求比较低, 并且强调思辨<sup>31</sup>。另外, 文中各位学者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够尊重和遵守核心的学术价值和规范。汪敬熙和黄翼之间观点的冲突最终导致黄翼没能在国内发表文章, 但实际上黄翼最后还是接受了汪敬熙的部分提议。周先庚从感情上支持黄翼, 但是他对黄翼文章支持的同时也考虑到了学理。黄翼也没有因为周先庚的友好支持, 就降低了自己文章的标准。格塞尔似乎出于悲痛心情, 给予黄翼的文章特殊青睐, 但是同时我们看到, 相关期刊编辑部通过注脚进行了微妙的抗议。同时, 这些学术规范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在黄翼和周先庚试图解决争端的过程中, 他们从不同角度质疑评审标准和流程, 向主编提供反馈意见, 试图加以完善。我们无法得知主编们当时的具体反应, 但考虑到吴有训没有直接拒绝黄翼的稿件, 国际学术文化资料供应委员会的主编以两千元国币预先录取黄翼的稿件, 可以得知主编们并不是完全刻板地遵守审稿规则。

### 7.2 知识生产者的心理因素

在这场评审风波的个案中, 不容忽视的是知识生产者的心理因素。黄翼为什么会为稿件被拒产生如此大的情绪反应? 又为何如此不屈不挠地开展研究并推动发表呢? 这背后是黄翼的学术抱负和个性使然。从总体上来看, 黄翼回国之后, 一方面积极开展儿童心理学方面的实践性工作, 另一方面开展纯学术的基础性心理学研究。就后者而言, 这样的研究的确需要以英文形式发表, 以实现与国际心理学的对话和交流。无论是英文期刊《科学纪录》, 还是国际学术文化资料供应委员会, 再到美国《普通心理学期刊》, 均是国内学者向国际学界传递声音的通道。黄翼将 7 篇英文研究报告寄到美国等待发表之后称: “……岁月蹉跎, 老将至矣。此次文字七篇在美发表之后, 至少某某数方面, 将信誉略为恢复, 否则此后更无出声之余地矣。”<sup>32</sup>又如: “自谓己志为开拓心理学研究领域奋斗终生。”(转引自贝时璋, 1984)可见黄翼在学术声望方面有着较高的追求,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稿件受挫之后情绪反应的强烈是可想而知的。另外, 就是黄翼的个性因素。他性情“外柔而内刚, 嫉恶如仇, 正直不阿,

<sup>31</sup> 欧洲兴起的格式塔心理学原本是哲学探索的一个方向, 其最终目的是探索心理现象的“格式塔”或者整体性规则, 对个别的心理过程并不看重。

<sup>32</sup> 黄翼 1944 年 4 月 16 日致周先庚信函。

对学校兴革诸端，常抒己见，持论往往一针见血，不徇私情。于时政邪恶，他人置若罔闻者，而黄师每义愤填膺，怒形于色。”(胡绳系, 1984)黄翼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耿公严正”“明辨是非”，通过这些后人对他的描述，就不难理解黄翼在一些信件中用词为何苛刻和严厉了。黄翼去世前曾称：“天实负我三十年寿命，吾将索焉。”(转引自 黄文宗, 1984b)正是在这种学术抱负和个性的影响下，黄翼才不屈不挠地执着于自己的研究。这份执着的背后是黄翼自己对心理学问题原创性地深入思考，也正是如此才使得他的研究在西方学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如法国著名哲学家，存在主义代表人物，知觉现象学创始人梅洛-庞蒂就曾深入讨论过黄翼的相关研究(Merleau-Ponty & Welsh, 2010)。1943年之后黄翼发表的7篇英文稿件都得到了导师格塞尔的大力支持，这不仅仅是师生情谊之故，更多地可以理解为是格塞尔对黄翼学术研究的强烈认同和信心。

### 7.3 知识生产的社会环境因素

心理学知识的生产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它受到外在在人际关系、科研条件以及社会环境的制约。黄翼此次研究报告发表屡屡受挫，周先庚从中协调，至最后在美国正式刊出，其背后都可以看到黄翼的人际关系参与到了其中。汪敬熙时任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所长，位高望重，于是才会在两次重要的学术研究报告审查过程中被邀请做审稿人。另外，汪敬熙在大力推动生理心理学研究的同时，曾撰文批评教育心理学，这也许是招致黄翼对他不满的一个诱因<sup>33</sup>。黄翼在被汪敬熙反复拒稿的挫折之下，发出了“此公盘踞要位(中央研究院)，中国心理学永无出头之日，何日得‘收复失地’为快”<sup>34</sup>的唱叹。从更高层面上来看的话，这其中也隐含着当时中国心理学学术生态中的一个问题，即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和各地方大学心理学专业之间学术关系，中央研究院因其较高的学术权威性，致使各地方大学心理学系多元化的研究旨趣和专业方向发展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另外，黄翼忧虑中国心理学的未来，也许并不完全是受个人情绪所驱使，而是其内心的学术抱负使然。他曾经几次向周先庚抱怨，说其所在大学的人事关系日趋复杂，影响着研究活动。周先庚也指出，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壮大，有赖于学术

共同体的建立。

就黄翼当时的科研条件而言，无疑是相当简陋和落后的，因缺乏研究助手只得事必躬亲，因缺乏实验设备而不得不自己动手制作，这一点令陈立(1944)为之不平：“一些简单仪器，十年不能成功。在国外也许是一两天的事，这岂不令人急煞？在如此环境下，任何天才也不能有大的成就，羽仪兄一生便葬送在这种环境之下。”正是这种科研条件的缺乏使得黄翼研究报告初稿并不完备。当时战争年代，国内学术文献的缺乏使得黄翼无法了解西方心理学最新进展，学术期刊发表条件的苛刻使得他无法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就黄翼的社会生活环境而言，陈立(1944)曾直言：“社会不曾给他研究的方便，不曾使他免为柴米劳心。冷漠与残酷使他忧悒而死，这岂是他个人的失败，这是社会的失败。”从格塞尔撰写的黄翼讣告当中，看得出来格塞尔对黄翼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科研也充满了敬意。可以说黄翼研究报告的曲折境遇也有着当时社会因素的影响。

## 8 启示

### 8.1 心理学历史研究方法学启示

从研究策略上来讲，心理学历史研究既可以对历史成就和进步进行颂扬性研究，也可以对历史曲折及内在冲突进行反思性、批评性研究(Harris, 1980)。长期以来，心理学历史领域中颂扬性研究占据着主导地位。歌颂式的历史研究能够增强心理学界的凝聚力和自信心，但是不能对心理学研究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局限提出针对性的意见。批评式的研究着眼于历史进程中的曲折和冲突，可以为心理学研究工作的完善提出具体的有建设性的参考意见。本文研究策略主要体现的是后者。我们需要做出两点说明：第一，我们对于文中提到的各位心理学前辈非常尊重。即使历史材料显示他们有情绪化、人际摩擦的时刻，我们认为这些情况的出现都是人之常情，任何人都难以避免。我们分析这些前辈们的心理和人际关系，并非是为了窥探隐私，而是为了还原当时事件发生的过程，我们论述最终的落脚点不在于对任何一个人做价值评判，而在于探讨更广义的问题：学术价值和规范有哪些？它们在审稿实践中是怎么被理解、应用和更改的？以索卡利(Sokal, 2003)的观点来看，黄翼的发表风波是我们的一个研究“标本”(type specimen)，而我们的关注点远超出了这个特定的历史事件。第二，传统历史

<sup>33</sup> 据徐訏(2012)著文称，吴俊升曾提到，汪敬熙有一种苦闷，那就是他的研究往往被生理学家当成是心理学研究，被心理学家当成是生理学研究。

<sup>34</sup> 黄翼 1943年12月24日致周先庚信函。档案编号：XJ-001-017。

观点对于知识产生过程的论述往往过于简单化, 过于强调连续的、协调一致的过程, 而忽视了历史事件当中的曲折、冲突、对立和协商, 而后者在历史的发展当中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尽管后者可能揭示了一些不够理想化, 不够美好的历史事件, 但是它们却是我们反思得以展开的基础, 以此更好地理解一个学科以及它怎样运作, 进而更好地引导研究工作。针对此点, 本文通过引入“科学知识社会学”来对科学进行“祛魅”(disenchantment), 即打碎对科学研究的“象牙塔”的流行印象, 并且提出实质性的参考意见(Danziger, 1994)。

从研究视角上来讲, 本文在国内第一次尝试运用了微观心理学史的视角, 把目光聚焦于特定历史事件细致入微的发展过程(Levi, 1991)。不可否认, 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是独特的,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必须考虑到各方面的历史背景: 黄翼所处的战争年代造成的研究设备和文献匮乏、生活条件恶劣、交通不便; 中国心理学发展初期的研究队伍规模小、分支发展相对薄弱; 学术共同体内部的机构设置、人际关系; 黄翼的性格、学术背景和志向, 等等。在尊重历史细节的基础上, 我们又试图总结出超越历史情景的主题, 即审稿流程的操作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各项审稿标准的利弊, 以及它们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被协商和改进。

从研究素材来讲, 本文运用了文献档案类型之一的信札。史学研究中“档案热”一直方兴未艾, 而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着忽视原始文献档案收集、积累的倾向, 大大掣肘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随着观念的逐渐改变, 中国近现代心理学的文献档案学工作任重而道远。

自劳埃·富鲁默托(Furumoto, 1989)将“旧史”和“新史”观念引入心理学之后, 西方心理学史学研究经历了一次较大的转向, 即由运用二手资料转向原始资料和档案, 由颂扬性研究转向批判性研究, 由关注主流心理学转向非主流心理学家, 更为关注研究对象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等。尽管心理学的“新史”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Lovett, 2006), 但是它仍为推动心理学历史研究产生了重要作用。从“旧史”到“新史”这一转向, 也曾得到国内心理学史的引介和讨论(周宁, 2003; 唐婷, 2009), 但在中国心理学史界并没有得到较好地实践性应用。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研究在国内仍属于有待进一步发展和繁荣的领域, 而发展和繁荣的基础就是研究取

向、策略、素材的多元化。本研究基本是在贯彻“新心理学史”(new history of psychology)这一新研究取向, 试以此推动“新心理学史”研究在国内的广泛开展。

## 8.2 心理学知识生产的启示

同行评审是现代知识生产的一个核心过程, 起到把关作用。不被评审专家认可的知识, 就是“不合法的”, 没有机会传播开来。反之, 成功的发表不但保证知识的顺利传播, 还会给作者带来事业、荣誉和经济利益。鉴于此, 同行评审的工作在提高研究水准、引导研究方向、保证学术活动的公平公正、调配学术资源等方面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同时有一个挑战, 同行评审过程一直是个相对非公开性的、个人化的过程, 似乎存在于知识产生过程的“黑箱”之中。因为同行评审难以接受公众的监督, 要想保证其公正就需要良好的学术风气和自我调整。本文通过珍贵的历史文献还原了上世纪 40 年代的一次同行评审过程, 分析了其中所涉及到的学术评价、知识生产者以及社会环境等影响因素。黄翼的论文发表风波已经过去 70 余年了, 中国心理学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说, 当年研究设备紧缺, 国内外交流极度困难的状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国内心理学期刊基本都会邀请多位同行专家审稿, 可以为投稿作者提出更加中肯的意见, 并根据多数专家的意见以决定录用与否。黄翼的发表风波对当今心理学研究仍然在不同方面存在启发意义。心理学知识生产过程在当代也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 而且有公开化、共享化的趋势, 以便接受整个学术共同体的监督, 其目标就是要维护心理学事业的健康发展。国内心理学界顶级中文期刊《心理学报》在这方面走在前列, 自 2014 年开始公开所有被录用发表论文的专家审查意见, 使得一部分心理学知识生产过程成为中国心理学界的共享性知识(李金珍, 庄景春, 邱炳武, 2015)。这一有益的实践必将为引领中国心理学的健康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国际上来看, 近年心理学界爆出了“心理学可重复性危机”(Schooler, 2014; Spellman, 2015)、学术抄袭以及贿赂发表等事件, 这实质上就是一场心理学知识生产的危机, 这场危机之下对同行评审提出了新的要求。近二三十年以来, 心理学在中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进入心理学知识爆炸性增长的历史时期, 希望本文所展示的心理学知识生产过程的问题能够推进中国心理学界由只重视知识生产的结果向知识生产过程和结果并重的转变, 从而促

进心理学知识有效而健康地生产。

**致谢:** 本文初稿曾得到南京师范大学崔光辉博士建设性的评论, 约克大学 Thomas Teo 和 Katherine Bischooping 二位教授对英文摘要进行了审订, 在此谨致谢忱! 感谢审稿专家和终审主编的建设性意见!

### 参 考 文 献

- Bei, S. Z. (1984).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forty anniversary of Mr. I. Huang's death. In W. Z. Huang (Ed.), *Child guidance studies: Memories of Mr. I. Huang* (pp. 4-7). Hong Kong, China: Yu Yi Book House.
- [贝时璋. (1984). 纪念黄翼先生逝世四十周年. 见 黄文宗 (编), *儿童训导论丛: 黄翼羽仪先生纪念文集* (pp. 4-7). 香港: 羽仪书屋.]
- Bedeian, A. G. (2004). Peer review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management discipline. *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and Education*, 3(2), 198-216.
- Benjamin, L. T., Jr. (2006). *A history of psychology in letters* (2nd ed.). Malden, MA: Blackwell.
- Chen, L. (1944). Achievement and failure of a psychologist: Mourning for loss of Mr. I. Huang. *Thought and Times*, (38), 6-13.
- [陈立. (1944). 一个心理学家之成就与失败: 敬悼黄羽仪(翼)先生. *思想与时代*, (38), 6-13.]
- Chinese Psychological Society &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07). *The complete works of Pan Shu* (Vol. 1, 2). Beijing, China: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 [中国心理学会,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2007). *潘菽全集* (第1, 2卷).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 Danziger, K. (1994). Does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have a future? *Theory & Psychology*, 4(4), 467-484.
- Fan, T. W. (2009). Huang Yi and his pioneering research on child guidance.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1(2), 182-188.
- [范庭卫. (2009). 黄翼与中国儿童心理辅导的开拓. *心理学报*, 41(2), 182-188.]
- Furumoto, L. (1989). The new history of psychology. In I. Cohen (Ed.), *The G. Stanley Hall lecture series* (Vol. 9, pp. 5-34).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Gesell, A. (1944). I. Huang. *Science*, 100(2606), 512-513.
- Harris, B. (1980). Ceremonial versus critical history of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35(2), 218-219.
- Hu, S. X. (1984).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forty anniversary of my teacher Professor I. Huang's death. In W. Z. Huang (Ed.), *Child guidance studies: Memories of Mr. I. Huang* (pp. 22-29). Hong Kong, China: Yu Yi Book House.
- [胡绳系. (1984). 业师黄羽仪教授逝世四十周年祭. 见 黄文宗 (编), *儿童训导论丛: 黄翼羽仪先生纪念文集* (pp. 22-29). 香港: 羽仪书屋.]
- Huang, W. Z. (1984a). *Child guidance studies: Memories of Mr. I. Huang*. Hong Kong, China: Yu Yi Book House.
- [黄文宗. (1984a). *儿童训导论丛: 黄翼羽仪先生纪念文集*. 香港: 羽仪书屋.]
- Huang, W. Z. (1984b). Memories of my brother I. Huang. In W. Z. Huang (Ed.), *Child guidance studies: Memories of Mr. I. Huang* (pp. 63-72). Hong Kong, China: Yu Yi Book House.
- [黄文宗. (1984b). 忆四哥黄翼. 见 黄文宗 (编), *儿童训导论丛: 黄翼羽仪先生纪念文集* (pp. 63-72). 香港: 羽仪书屋.]
- Huang, I. (1945a). The size-weight illusion in relation to the perceptual constancies. *The Journal of General Psychology*, 33(1), 43-63.
- Huang, I. (1945b). The size-weight illusion and the "weight-density illusion". *The Journal of General Psychology*, 33(1), 65-84.
- Levi, G. (1991). On Microhistory. In P. Burke (Ed.), *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pp. 93-94).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Li, J. Z., Zhuang, J. C., & Qiu, B. W. (2015). Trial on open peer review conducted by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Chinese Journal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eriodicals*, 26(2), 139-142.
- [李金珍, 庄景春, 邱炳武. (2015). 《心理学报》开放性同行评审方式探索及初步成效.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6(2), 139-142.]
- Lovett, B. J. (2006). The new history of psychology: A review and critique. *History of Psychology*, 9(1), 17-37.
- Merleau-Ponty, M., & Welsh, T. (2010). *Child psychology and pedagogy: The Sorbonne lectures 1949-1952*.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Schooler, J. W. (2014). Metascience could rescue the "replication crisis". *Nature*, 515, 9.
- Shen, Y. Q. (1984). Missing brother I. Huang. In W. Z. Huang (Ed.), *Child guidance studies: Memories of Mr. I. Huang* (pp. 1-2). Hong Kong, China: Yu Yi Book House.
- [沈有乾. (1984). 怀念翼兄. 见 黄文宗 (编), *儿童训导论丛: 黄翼羽仪先生纪念文集* (pp. 1-2). 香港: 羽仪书屋.]
- Sokal, M. M. (2003). "Micro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Thick description" and "the fine texture of the past". In D. B. Baker (Ed.), *Thick description and fine textur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pp. 1-18). Akron: The University of Akron Press.
- Spellman, B. A. (2015). A short (personal) future history of revolution 2.0.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0(6), 886-899.
- Tang, T. (2009). *The historical prospect of psycholog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raditional history and new history*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 [唐婷. (2009). *心理学的历史图景: "旧史"与"新史"的比较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湖南师范大学.]
- van Rosmalen, L., van der Horst, F. C. P., & van der Veer, R. (2011). An unexpected admirer of Ladygina-Kohts. *History of Psychology*, 14(4), 412-415.
- Wang, G. C. (1984). *Shui Long Yin* and introduction. In W. Z. Huang (Ed.), *Child guidance studies: Memories of Mr. I. Huang* (pp. 8-9). Hong Kong, China: Yu Yi Book House.
- [王淦昌. (1984). 水龙吟并序. 见 黄文宗 (编), *儿童训导论丛: 黄翼羽仪先生纪念文集* (pp. 8-9). 香港: 羽仪书屋.]
- Xu, X. (2012). Mr. Wang Ging-Hsi. In X. Xu (2012), *Selected works of Xu Xu* (Vol. 11, pp.112-114). Shanghai, China: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Press.
- [徐訏. (2012). 汪敬熙先生. 见 徐訏 (编), *徐訏文集* (第11卷, pp.112-114).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 Yan, S. C. (2015a). *A history of modern psychology in China (1872-1949)*. Shanghai, China: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
- [阎书昌. (2015a). *中国近代心理学史(1872-1949)*.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Yan, S. C. (2015b). Collabor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psychologists on assessing intelligence paratroop commandos during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The Chinese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6(3), 355-363.
- [阎书昌. (2015b). 抗战时期中美心理学家合作开展情报伞兵突击队心理测评. *中国科技史杂志*, 36(3), 355-363.]
- Yan, S. C., Chen, J., & Zhang, H. M. (2012). Siegen K. Chou's military psychological practices and thought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4(11), 1554–1562.  
 [阎书昌, 陈晶, 张红梅. (2012). 抗战时期周先庚的军事心理学实践与思想. *心理学报*, 44(11), 1554–1562.]  
 Zheng, S. (2013). Ging-Hsi Wong and Chinese physiopsychology. *Protein & Cell*, 4(8), 563–564.

Zhou, N. (2003). Unscramble th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psychology: The revelation among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history to the new. *Th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2(3), 62–66.  
 [周宁. (2003). 重新解读西方心理学史: 从“旧史”到“新史”的启示.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3), 62–66.]

## A microhistory of psychology in letters: What happened to I. Huang's research reports on the size-weight illusion?

YAN Shu-Chang<sup>1</sup>; GAO Zhipeng<sup>2</sup>

<sup>(1)</sup>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sup>(2)</sup>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York University, Toronto M3J1P3, Canada)

### Abstract

In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history and sociology of science, peer review practice has been scrutinized. However, historians have not paid any attention to this important topic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sychology. Primarily based on thirteen recently discovered letter correspondences among leading scholars such as I. Huang, Siegen K. Chou, and Wu Youxu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omplicated stories behind I. Huang's two publications on the size-weight illusion using a microhistory approach. I. Huang (1903-1944) was an important Chinese psychologist who received trainings in child psychology and Gestalt psychology from Arnold Gesell and Kurt Koffka in the USA. A few years after returning to China, Huang's research was severely impeded by the Sino-Japanese War, poverty, and terminal cancer. Nonetheless, Huang persevered in conducting research in hopes of delivering two research reports to international colleagues. Unexpectedly, in 1941 and again in 1943, the only two state-run international outlets both invited the same reviewer, Wang Jingxi, a physiological psychologist heading the Psychology Institute of Academia Sinica, who kept criticizing Huang's reports. Unconvinced by Wang's criticisms, Huang wrote letters to the editors in defense of his reports as well to his old classmate and colleague, psychologist Siegen K. Chou, for support.

These correspondences discussed a number of core issues in the peer review practice: evaluation criteria, the composition and qualifications of reviewer (s), dispute resolution, and 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factors that shape research activities. For example, various evaluation criteria – originality,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methodological rigor, sample size, experimenter effects, the suitability of the statistics used, replicability, referencing, and language style – were brought up and discussed. In Huang's view, Wang nitpicked about language style while downplaying other more important criteria, failed to appreciate that high reliability an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an overcome the limitation of the small sample size, and did not possess appropriate expertise to evaluate his research. When Wang criticized Huang's study as repetitive of extant literature, Huang argued, first, that successful replication is not entirely useless, and, moreover, that his research was mainly aimed at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rather than empirical findings. Huang admitted that his reports did indeed have certain shortcomings but argued that the wartime scarcity of literature and research equipment had made these inevitable. For instance, such scarcity had led to Huang's lack of awareness of extant literature resembling his independent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order to resolve the disagreements, Huang contended that his methodological and language choices were no different than those of authoritative psychologists. When Huang called upon Siegen K. Chou to mediate the dispute, Chou delicately voiced his support of Huang, his intimate friend and colleague, while paying due respect to Wang, the leading figure in Chinese psychology. Chou echoed Huang's proposal of recruiting additional reviewers, and offered further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peer review process. Finally, Huang refused the two state-run outlets' sympathetic offers of acceptance of the articles along with remuneration. He instead submitted the articles to *The Journal of General Psychology* based in the USA. Unfortunately, Huang soon passed away in extraordinary hardship before his articles were published.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published papers include editorial footnotes about their having been accepted by Arnold Gesell, who deeply respected and mourned his former student.

**Key words** I. Huang; letters; microhistory of psychology; research normativity;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